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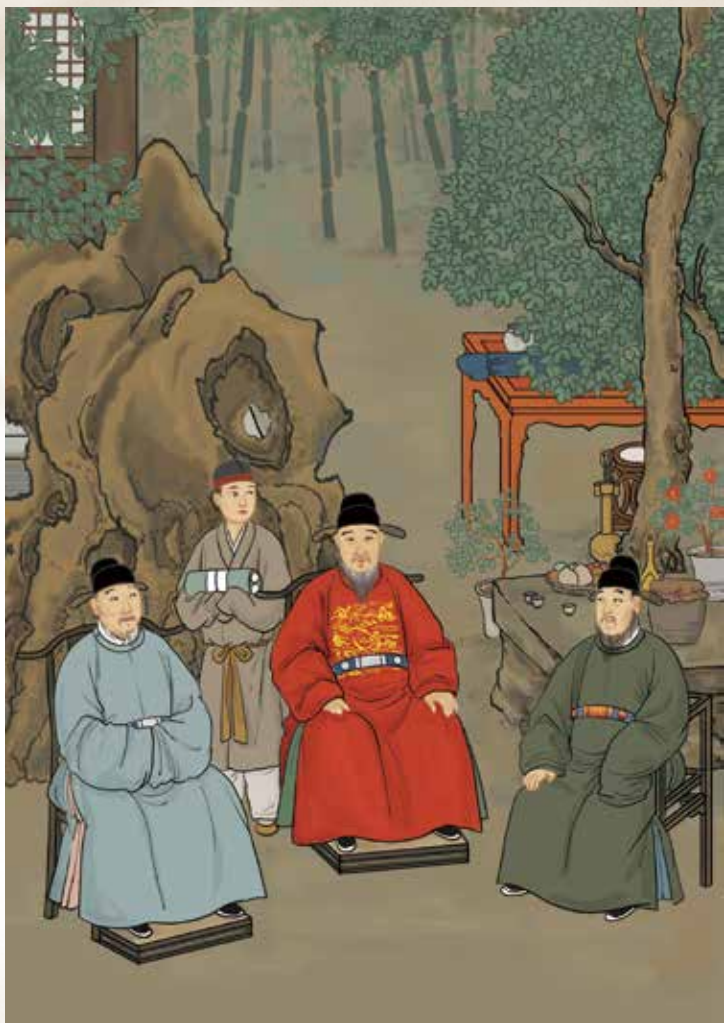


三案始末

溫功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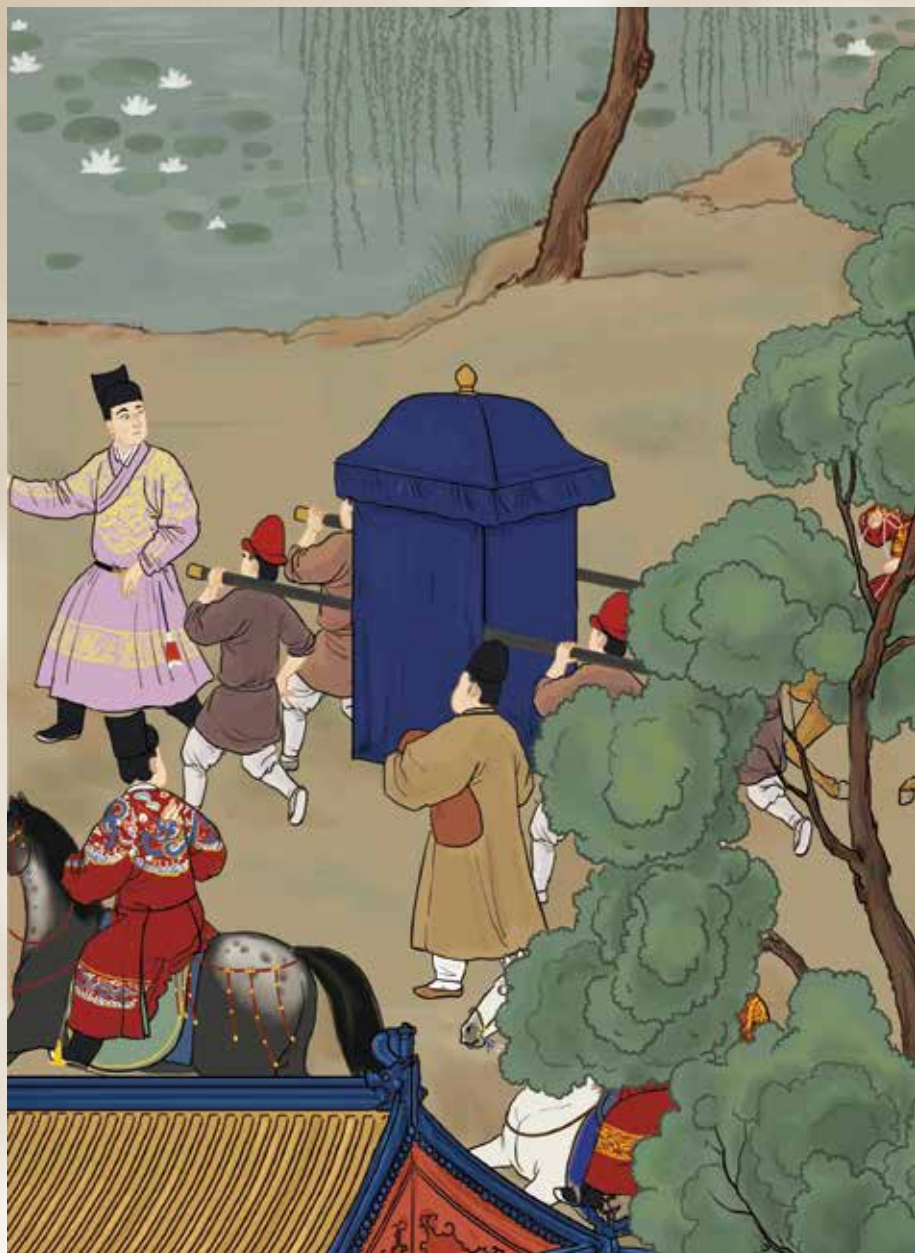
燕王 WF 繪





左：賜死汪廣洋

右：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為閣臣時，是明代昇平之世，史稱「三楊」



嘉靖傳諭，進入西苑只准騎馬，不許坐轎。不同於夏言的執拗，嚴嵩不但謹遵，還在香葉冠上籠以輕紗，以示虔敬







左：鄭和下西洋

右：李太后叫撞了禍的年輕萬曆跪下，審問叱責之餘，命其朗讀張居正代擬的「罪己御札」，深刻知罪



左：查抄馮保前，萬曆擔心：「大伴如果衝上殿來，朕可怎麼辦呀！」張鯨、張誠從旁寬慰

右：鄭貴妃晉封皇貴妃，冊封詔書和寶印被抬進宮中





左：張差手持木挺，潛入宮門，擊傷內侍

右：已經自知不行的皇帝很想試試這個仙方，命人即刻獻上紅丸







左：群臣積憤已極，紛紛湧到乾清宮外，喧叫着要李選侍趕快搬離

右：汪文言輾轉託人，最後竟把門路走到了對頭魏忠賢那裏



崇禎煤山自盡

目錄

前言·····	001
帝權與相權·····	009
從宰相到閣臣·····	037
內監·····	077
萬曆·····	095
立儲上的猶豫不決·····	133
梃擊案始末·····	155
紅丸案·····	167
移宮·····	181
《三朝要典》，三案翻了過來·····	199
崇禎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	219
餘波·····	233



前言

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是發生在明朝萬曆末年的、彼此相關的三個宮廷案件。當時，它們被稱為三案；明亡後，有些史家則稱之為明末三案。

這三案雖說是宮廷案件，但其影響所及，卻已遠逾宮廷，波及於都城內外，以至邊關和江南。由於種因遠、影響大，所以自始便很為史家重視。它在當時之特別受人重視，是由於歷時久而牽扯多，自內廷至外廷，多少人都捲入其中，有的還被弄得傾家蕩產，並死於非命。後世之所以重視它，除去上述原因而外，還由於通過三案的成因和經過，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來一力增重帝權，積勢所及，產生出何等的積弊。

歷代的封建王朝，在增重帝權以求確保家天下的統治這一做法上，都曾做出了不斷的努力，每個新王朝的興起，大

致都要總結前代之所以失，想出一些補救的辦法，也就是所謂「興利而除弊」。在這種興革方面，明代是很突出的。有很多地方，它做出了極不同於以前各代的改革。這些改革，是經過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以後的諸帝，不斷繼承祖訓、加以因革才形成的。

明太祖的改革，最突出的一點是廢除了歷代相承的宰相制。本來，他是無意廢除這一制度，仍然承襲舊制的，所以在還沒有建立起大明帝國、還稱為吳國之時，便設立有左、右丞相的職位；到建立明朝以後，丞相一職也還保留了十餘年之久。但是帝權與相權之間，自來便是互為消長，不斷產生一些衝突的。朱元璋為了增重自己的權勢，並為自己的子孫建立起穩固的基業，終於除掉了李善長、胡惟庸、汪廣洋等幾個曾居相位的人，並廢除了這一職位。

取消了宰相的職位後，明太祖就把應由宰相掌管的事務重新作了劃分：他把定制決策等大權，收歸帝室，親自掌握；實際的政務，則交由六部分擔，提高了六部尚書的職權。但作為皇帝，自來便有「日理萬機」之稱，事務實已很多，而定制決策都要筆之於書，寫成文件，這也是他力所難及的，所以動筆之事，還得另外有人來做。明太祖以至在他去世後繼立為帝的皇孫朱允炆，便把這些事務交由翰林院中在內廷修

史、修文的學士們來做。做這些事的人，在最初的二十餘年中，一直是既無定職，又無定員，但他們確實又分擔了歷來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把宰相的工作分由皇帝、六部和無定職的詞臣來分擔，常常不免會顯出散亂，並帶有一種臨時性的樣子。使這種做法固定下來的，是舉兵攻入南京的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朱棣很能體會他父親要把相權分散的心意，卻又要有專人專職來做那份原是並無定職、定員的工作。從他攻入南京，便建立起了明代的代替宰相的閣臣制度。這一制度，一直實行到明朝滅亡。

第一批被任為閣臣的有黃淮、胡廣、楊榮、解縉、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七人。人數多，爭吵衝突也就多，結果七人中解縉便被排陷而死，黃淮也因陷人得罪，去職入獄。他們的相爭是由於爭奪首列的位置。明代的閣臣也被稱為輔臣，列居首位的稱為首輔，首輔因有擬旨的特權，和皇帝的接觸比較多，所以成為閣臣間爭奪的目標。最初，閣臣間雖排有名次，但並非定而不移的，如解縉原本名列第四，後來卻躍居首位，壓倒了黃淮，以此形成了排陷的事件。後來很快在閣臣間便形成了名次定而不移的慣例，位居首輔的，永遠居於首位，僅居其次的次輔，要想獲得首輔的種種特

權，必須等到首輔離去之後，才能遞升，而首輔一旦歸來，他卻又得退居次位，交出已有的特權。這樣閣臣間的爭奪排擠，明爭暗鬥，就更形激烈，而且唯恐去而復回的首輔興心報復，傾陷的手段更加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方才放心。所以明代閣臣間的互爭，遠遠超過了以前歷代只有左、右二相的那些時候。這種爭奪，對於明代諸帝來說，毋寧倒是很歡迎的。因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所謂雄猜之主，為了有利於他們後世兒孫的統治，臣下互攻，倒覺得是個好事。他們的子孫，對於其「二祖」的心意心領神會，在這方面續有所為，更逐漸建成了各部之間互有牽制、常多爭議的政治機構，統治起來更加安全而又省力。明代有很多皇帝或想求仙，或是耽於酒色，常常多年倦於臨朝，但他們的皇位和權力卻一直保得很牢，不能不說是由他們所建立的這種互制局面取得的效力。但群臣大多陷於互爭，於皇位的安全雖然有利，而於文化、經濟等方面則又起到了很壞的作用，一切日趨腐化，終於導致覆亡，則又是他們沒能料到的了。

明代的內監有些人能到內廷所設的內書堂裏讀書，並公開取得了代替皇帝批示擬旨的權力，使明代各部之間的牽扯互攻更有所擴大，以致牽連到宮廷中的后妃和王子。本來，朱元璋有鑒於宦官之為患，對於內監的限制是很嚴的，不但

不許他們論及政事，或與外官往來，而且嚴禁內監識字。他還命人將這些禁例，刻在宮門外的鐵牌上，並且寫進他留給後人的《洪武實訓》一書裏。對於這些訓誡，在口頭上，他的後人雖都聲稱應予確遵，實際上則遵與不遵各由是否於己有利為定，有的不但不遵從，甚至背道而馳。例如，設立內書堂，派大學士來教有些小內監讀書為文，使他們習於為政，便是違背所謂祖訓的最突出的一點。

內監有了「批朱」權，能代皇帝批示內閣進入的擬旨，就使相互制約的局面更形複雜，宮廷與外廷之間，有些事也攪成一團了。三案的拖延之久、影響之大，便是由這種混亂局面所形成的。所以後來有些史家在研索三案之餘便說，如想弄清明代相互制約的混亂糾紛，從三案入手，倒是個極好的捷徑。

本書之作，便是想由三案這一捷徑入手，使讀者稍見明代統治階層之間的內部糾紛，看清他們是如何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爭奪排擠，而使國政日趨荒廢的。如不對明代統治者間的各種政治力量稍有了解，便難於較清楚地了解三案，所以我首先便從宰相制的廢除說起，使讀者知道，明代的閣臣——雖也被稱為相臣，入閣也被認為是拜相——其職責卻與前代的宰相大有不同。知道這點便能對後來所形成的門戶

之爭有些了解。歷代宦官為亂，事例也多，但明代卻很有些不同於歷代之處，本書擇要略加敘述，也是想使讀者在這方面增長一些見識。明神宗（萬曆）是三案的造因者，對他自然不能不稍加敘述，同時由他也可稍稍知道一下明代宮廷之內的一些事情。這些都是了解三案的內情所必須交代的。

帝
權
與
相
權

宰相之為帝王的輔佐，其淵源是很久遠的，也可以說自從有了帝王以來，就有了地位僅次於帝王的宰相。

這一制度，歷來便都為論者所肯定。每當說到太平治世，總是以明君善於擇相、賢相能竭誠事君，作為主要因素。很多相處得較為和美的君相之間，彼此也常以融和無間、如魚得水，相互讚譽。粗粗見來，似乎君相之間總是以和衷共濟、同心協力才是正道。但歷觀史籍、揆諸實際，卻又不然。自殷周以來，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其間帝王掌握着最高權力，處理實際的政務則較宰相為少；宰相掌握着次高權力，而處理實際的政務卻較帝王為多，彼此互為消長，彼此意見相合時固然常有，而彼此意見相異時卻也時見。相合自然無話可說，相異則不免要相互讓步，或竟發生衝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極早的例證。自此而後，君相之

間的鬥爭就沒有斷過，只不過是衝突的緩和與激烈各不相同而已。這期間，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都是以相權壓倒了帝權的突出人物。

君相之間雖說不斷有些爭持，但從權位上來說，優勢自然總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時候為多。而且每逢改朝換代，君相之間的權勢總要有些變化，這變化的趨勢則是帝權不斷上升，相權不斷下降，因為每個開國之君為了保全他的基業，總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對帝王起到約束作用的條文，而添上一些擴大王權的條文。歷代繼續這樣修改，帝權與相權之間的距離也就越來越大。這樣，到了明初，帝權和相權之間相距便已絕遠，但明太祖朱元璋還是覺得宰相的權力對他的帝業終究是個威脅，最後終於把這個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給廢除了。

廢除了宰相制，君權越發增重了，君主專政，至此已發展到了頂端。這對於帝室的穩固自然是有利的，在有明一代的一十六帝中，於童年間便即位為帝的很有幾個，另外又還有些倦於理事的人，多年避居深宮，很少臨朝問政。然而即便如此，帝權還是很鞏固的，並沒有出現過權傾一朝、足以代立的人物，其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應該說是取消了宰相制的緣故。不過，也正由於居安無危，明代諸帝，除去建國初期

的所謂「二祖」以外，都極缺乏歷練，只有宣宗、孝宗，稍為後世加以稱許，其餘都不過是些碌碌無為的人，坐視國是日非而振作乏術，終至內外交困，以至於亡。這又是一心只為增重帝權而殫精竭慮的人所沒能想到的。

明太祖朱元璋之終於廢除了宰相制，是在他建國為帝後，為了鞏固帝權，經過多年的思慮和謀劃，最後才毅然決定的。最初，他對設立宰相輔佐國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並無一點疑慮。早在他建立大明帝國之前，還是稱為吳國的時候，便已經設立起了宰相的職位。從吳至明，宰相都稱為丞相，共有左、右二員。那時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長，位居右丞相的則是徐達。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國，即位為帝以後分任左、右丞相的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那時丞相的任所稱為中書省，丞相之下設有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職稱的屬員。徐達在中書省為右丞相的時間並不久，只有兩年略多些，後來便因要率領軍隊出征而離開了那裏。李善長在徐達離去不久，也因病致仕（即退休）家居。繼李、徐而任職丞相的，又有汪廣洋和胡惟庸兩人，汪是在李善長於洪武四年（1371）正月致仕之時即被任為右丞相，繼李而來掌管中書省的事務的。胡惟庸比汪廣洋的入相要晚兩年多，他是於洪武六年（1373）七月才被任為右丞相的。有明一代曾任職丞相

的只有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四人，只從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三年（1380）初，有過以左、右丞相為首的中書省；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謀叛被誅，中書省也隨之而被撤銷，此後丞相的官名和職所便都化為烏有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即位為帝後才逐漸感到帝權和相權之間的衝突，幾經設法想要加以調整，但都並不令他滿意，最後才決意廢除這一制度的。從他們君相之間自開國以至最後李善長一家被族誅，明太祖的不斷謀劃，事後看來，還是很顯然的。

徐達在相位的时间最短，他又是四個丞相之中唯一未被處決的人，所以在他和朱元璋的關係之間，有關宰相制的廢除的跡象並不多。可以略去不說。

首先要說的，應是朱元璋與李善長二人之間的變易。李善長是在朱元璋還是郭子興的部將之時，便與他在軍中共事的舊人，他們原是相交極厚，彼此非常相得的。李善長是個極有智計，料事多中，並且極有決斷，敢於任事的人。史家說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很確切地道出了他的特點。正由於此，他在作為郭子興的一個部將的參謀之時便已極為有名，引起了郭子興的注意，郭曾很有意把李善長從朱元璋的幕中選拔出來，作為他自己帳中的參謀。

那時的朱元璋對李善長正是倚信至殷，認為誰對他的幫助也趕不上李善長，如何捨得讓他被調走？但是郭子興的諭令他又不敢違抗，真是去既難捨，留又不能，陷入了極其為難的困境。同樣，李善長也不願離開朱元璋而另圖高就。一則是因為他在朱元璋這裏是居於首席謀士的地位，真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心意互通；轉到郭子興那裏，會變成人微言輕，哪裏比得上這裏？其次，就是他後來常常誇說的，他早就看出朱元璋生有異稟，是個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樂意一直輔佐着他。李善長不愧是個「多智計」的人，他對郭子興的拔擢想出了很多辭謝的方法，通過多方說項，終於使得郭子興既不怪罪，又擺脫掉了他的選調，仍舊留在朱元璋的幕中。經過這樣一番周折，朱、李二人的情誼又更增進了一步，合作得更見盡善盡美了。

在天下未定之時，李善長和朱元璋二人之間，實在是日見親厚，有似如魚得水一般。這由於李善長確實很有才幹，而又勇於任事，多謀善斷，很多決不待時的事，他都能抓緊時機，不多和人商量，獨自及時便辦妥了。朱元璋得他這樣相助，真是事事都可放心，省卻無數麻煩。對於朱元璋來說，在他連年征戰，削平群雄，以迄建國之時，李善長確是一個兼具蕭何與張良二人之長的人物。在軍中，李善長是「為參

謀，預機畫，主饋餉」，指揮作戰和組織供應，他都兼管到了。在建國之初，一切有關政、經等項的法規和制度，以及郊社宗廟等的禮節和儀制，也都是由李善長親自加以制定，或者由他率領有關諸臣，一一加以制定的。明代建國之初，論起功來，無論就任何方面來說，李善長應為功臣之首，實在是眾口一詞，並無爭議的。朱元璋對於這一點也很明白，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長是居於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達、常遇春的兒子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在為他封公的制詞中，明確地把他和漢初的蕭何為比，也正顯然表明了當時人們對他的一致看法。

朱元璋和李善長的相離日遠，最後竟成為相互有敵意，是在建國之後才逐漸開始的，也就是帝權和相權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而引起來的。這也是情勢不同，利害各異，因而產生的必然結果。在逐鹿中原的軍中，敢於任事，當機獨斷，原是極可讚許的長處；而在建國之後，則不免被目為獨斷專行，為已登大位的皇帝視作不能忍受的行為。這種情況，可以說是，自古以來無代無之，所謂「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便正說明了這個。范蠡在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國之後便泛舟五湖；張良在輔佐劉邦平定天下之後便飄然遠引，從赤松子遊。這些事之所以為歷代論者歎賞稱許，便是由於他

們能夠看清時勢的變易，而情況有異，能夠早自為計，潔身而退的緣故。李善長輔佐朱元璋建國，有類於范蠡和張良，但在功成身退上卻絕異於他們，而明太祖朱元璋的雄猜之處又絕不遜於勾踐和劉邦，甚且尤有過之，所以二人在建國之後，共富貴時，便難於搞得好了。

由於李善長沒能見到時勢有異，行事也應有所不同，所以他在洪武初年身為左丞相時，與他身在軍中作為謀主之時並無甚麼改變，甚至專恣自用還更有過之。凡是讓他覺着看不順眼的人，或是有人冒犯了他，便毫不寬貸，立即定下罪名，奏而黜之。在他，原不過是本着他的敢於任事，當機立斷慣例，照舊而行而已。但在已經身登帝位，成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看來，這樣的做法，卻是太過目中無人，竟然忘了還有他這麼個高居尊位的皇帝了。一次兩次，尚自猶可，次數一多起來，更覺忍無可忍。他對李善長的不滿，便是由此開始，對於相權感到應該有所限制，也是由此而產生了苗頭。但是，李善長的功高望重，他還是很清楚的，處置不當，會引起不少不良後果，他也非常明白。他雖十分不快，但還是隱忍着，等待有個適當的機會。到洪武四年（1371），這樣的機會恰好來了。那是恰好李善長患病在家，自覺多日未能前往中書省治事，心有未安，便上疏懇請致仕。他這樣做，

無非是略以示意：一則是略示未能任事心有未安，二則也是藉此以為探試，看看皇帝對他究竟如何。這種手法，也是歷代大臣所慣用的。李善長認為，疏文遞上之後，皇帝溫諭慰留是肯定的，他想知道的，不過是慰留的詞句到底可以達到何種程度罷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朱元璋得到奏疏之後，並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下詔溫諭慰留，而是順其所請，立即欽批，准其致仕了。這對李善長來說，無異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朱元璋所以這樣做，也是深思熟慮過的，有他的用意。這一則是明白顯示出恩禮之衰，使李善長自己感到，不再恣情自用，可以保住晚節；再則，讓他離開政府也可減少他們彼此之間的摩擦，對李善長來說，也寓有保全之意。不過話雖如此，這種做法還是顯得過於寡情，有些近於毒辣。以功高望重如李善長而言，結果竟至如此，實在很令人寒心。這些，朱元璋自己也很明白，他的補救方法是從賜給優厚上加以彌補，對李善長的家人也特加恩禮，到洪武九年（1376）更將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下嫁給李善長的長子李祺為妻，恩遇更見加重。這樣，李祺便成為位在伯爵之上的駙馬都尉，李善長也成了國戚，從表面上看來，關係比以前彷彿更為親密了。其實，這種一打一拉的做法，已為歷來所習用，起不

到甚麼作用了。

徐達是在李善長致仕之前便已離開了中書省的，李善長如又致仕，便會主持無人。那時朱元璋雖已感到宰相的權勢對他的帝權很有威脅，但還認為那只是由於李善長恃功恣肆，所以才會如此，換上個謹飭小心的人，情形便不同了。經過多方權衡，明太祖選中了由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就在李善長獲准致仕之日，便也是汪廣洋得入中書省，調升右丞相之時。

汪廣洋也是個追隨了朱元璋很久的舊人，還在朱元璋建號吳國之前，他便已在朱元璋的帥府中任職。汪廣洋在帥府中所任的官職是令史，那是個兼具參謀和秘書的作用的職務。汪廣洋是個遇事很能深思，小心謹慎，且又精明仔細的人，他是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為朱元璋素所深知的，選他來接替李善長，正是看中了他的這些特點。

汪廣洋曾兩度出入於中書省，都是被任命為右丞相。第一次是於洪武四年（1371）正月接替李善長獨任相職。這次他在中書省工作了整整三年，於洪武七年（1374）正月，以「無所建白」，被降為廣東參政。第二次的任職時間比第一次還略短些，他是於洪武十年（1377）九月又被調回重任右相，到洪武十二年（1379）又以得罪去職的。

汪廣洋的兩度出入中書省，都和李善長有些關聯。他和李善長雖然都曾在朱元璋的帥府任職，但兩人間的往來並不多，朱元璋用他來接替李善長，這一點也是決定的原因之一。汪廣洋是個細心人，朱、李之間暗中已有矛盾他是很清楚的，接事之後，為了仰體帝心，自然更要竭力保持和李善長少有往來。他這樣做，是很為皇帝所稱許的，這成為他有利的條件。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疏遠着李善長，在工作上又給他帶來了很多的阻擾和麻煩，他第一次竟以「無所建白」去職，最致命的原因便就在這裏。他是以謹慎小心、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的，這些長處作為一名令史雖然頗為裕如，但作為一名見利害於機先、決成敗於廟堂的宰相，他可就顯得才力有所不及了。李善長的專斷固然使朱元璋着惱，但其處事善得機先，洞中竅要，卻又使他深為讚歎；汪廣洋凡事都必請示，雖說是個長處，但事無巨細，都得他自己來想主意，可也是個麻煩。相比之下，便更顯出李善長的好處來了。另外，李善長雖說致仕家居，卻仍居住在京，對政務的影響依然頗具潛力，而且中書省的屬員，如左丞、右丞、參知政事等官，都是他一手提拔、安置下的，他人雖去職，聲威仍在，很有遙控政柄的作用。汪廣洋如果對李善長敬如前輩，隨時都向他請教，或者還可少些麻煩，對之疏遠，彼

此成了對頭，阻力可就大了。

李善長致仕家居而能遙執政柄，另外有個原因也很重要，那便是明太祖感到自己待他顯得太薄，擔心影響不好，為了改善觀聽，遇有大事，每常加以諮詢；汪廣洋顯出辦事乏力之後，對他的諮詢也便更多。李善長掌握了朱元璋對汪廣洋日漸感到失望的情況以後，於是因利乘便，得以把與他親厚的胡惟庸推薦進中書省。

胡惟庸是於洪武六年（1373）七月進入中書省的，他與汪廣洋一樣，也是被任為右丞相。左相無人，身在相位的兩人卻同為右相，這是出乎常規的。以歷來的規例而言，汪廣洋資歷在前，應升為左相，二人一左一右，稍見軒輊，才是正理。同居右相，雖說互不為下，但卻很顯然地透露出了對先已在位者恩禮已衰，其將不能久居其位，明眼人也便立時可以感到了。

胡惟庸很早便以精明幹練受知於李善長，曾多次受到他的推薦和提拔。他們之間的情誼日見深厚，後來更成了親戚，胡惟庸把他的女兒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李善長把胡惟庸薦入中書省，一則是由於彼此關係密切，更有利於他對政柄的遙控；再則也是看出了汪廣洋勢位難保的契機，想由胡惟庸把他從中書省擠出去。

進入中書省，胡惟庸的境遇和汪廣洋實在大有不同。李善長的那些舊屬，都盡力幫他，他本人又是個辦事幹練、頗多智術的人，任事之後，一切都顯得頭頭是道，很快就把汪廣洋比得越發黯然無光了。朱元璋早就感到汪廣洋實非相才，胡惟庸入相後，對比之下，更覺顯然，所以才只過了半年，便已迫不及待地將汪廣洋貶謫到廣東去了。

胡惟庸才始入相，明太祖對他是很滿意的，因為他既比汪廣洋善於任事，又不像李善長那樣遇事專斷，有兩人之所長又無其所短，實在是個很合理想的人物。胡在和汪共相時，確實也表現得很好，因為他一上來便和李善長有個要把汪廣洋擠走的默契，所以盡心竭力，在在都要把汪廣洋給比下去。等到心願已遂，汪廣洋已被擠走，他的做法漸漸便又不像以前那樣了。這一則是他自覺已經獲得信任，不必再像以前那樣事事都加倍小心；二則是汪廣洋已去，少了個礙手礙腳的人，放開手腳不會再有甚麼忌諱了。明太祖是個雄猜之主，對於臣下無時不在訪查，對於這些變化，如何會長久不知？漸漸他已發現，胡惟庸遇事隱瞞、專斷！與李善長也竟相差不多，而其貪婪好利，比起李善長來，甚至還有過之。此外，他還發現李善長和胡惟庸頗多相互勾結之處，李善長遙執相權的作用比以前似更甚了。看到這些，他深悔把汪廣

洋降逐一事，覺得汪廣洋如在中書省，雖說辦事無力，但卻像是他的耳目，情況會好得多。

汪廣洋被貶為廣東參政，當然不會平心靜氣，他知道擠走他的雖然是胡惟庸，而在暗中作為主謀的卻還是李善長。他懷着一口惡氣離京赴任，暗中卻下定決心，要設法加以報復，出出這腔怨氣。他雖遠在廣東，對李善長的所作所為，卻時刻加以注意，一點也不放過。到洪武九年（1376），他把李善長的不法行為已經搜集到了很多，便和與他同時做過御史大夫的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列舉了李的種種罪行，認為李善長實已犯有「大不敬」之罪，不能不予以嚴懲。這一疏文遞得正合明太祖的心意，他想到汪廣洋與李善長和胡惟庸原本就很不和，如今有了這本劾疏，嫌隙就更顯然，如果把汪又調回中書省，胡、李二人定多顧忌，再不敢相互勾結，常事欺瞞了。主意打定，立即便予施行，於是就在洪武十年（1377）九月，先將胡惟庸升為左相，同時又把汪廣洋從廣東調回，重進中書省，又任為右相。他這樣做，用意很深。升任胡惟庸為左相，是因為辦事還想靠他，予以晉升可以具見倚畀之意；再則，調回汪廣洋，胡不免會有些驚疑，有此一升，也是加以平復。汪廣洋調回，不過是作為耳目，是要讓他起點妨礙作用的，但又不必過於妨礙，以致或竟會至阻礙

正事，做個右相，稍有差別，倒是正好。他的算盤打得很好，但實際上卻又一點也沒能夠如他所願。

汪廣洋沒能如明太祖所願，有很多原因。從他自己這方面來說，他原是個小心謹慎的人，一力疏劾李善長是由於負屈被謫，一腔憤怒，才鼓起他的勁兒來的。既經官復原任，他自覺總算有了公道，便不願再行多事，那樣就不合乎「君子不過為已甚」之道了。更有甚者，他覺得自己那麼力攻李善長，而疏入之後竟然毫無影響，可見他的根基之固，再去惹他，未免也太不明智了。他和胡惟庸共事的半年中，雖說受到過抑壓排擠，但對胡的辦事能力和聖眷日隆，則是印象極深；胡又晉升左相，更加深了他的深得帝心的印象。有了這樣的看法，所以汪廣洋對李、胡兩人便都「敬而遠之」，對他們既不表示親近，也不敢再找麻煩，只想以虛與委蛇作為自保的得計。從胡惟庸那一方來說，明太祖何以要把汪廣洋調回中書省，用意所在，他是很清楚的，最初當然既很不快，也不免稍有顧忌。但是他對汪廣洋一向頗為輕視，以前同為右相，他又是個新手，尚且沒把汪廣洋放在眼裏，如今他的位置較高，更加覺得並不足懼。經過三兩個月的觀察，覺得汪廣洋比以前似乎更加怯弱，於是不但不因而稍形收斂，反而更加恣縱起來。

把汪廣洋調回中書省重任右相，是明太祖解決帝權與相權之間的衝突的最後一着。這一着的失敗，使他很是氣惱，打算撤銷中書省，廢除宰相制的想法，至此已初步形成。但是廢除歷代留下來的制度，絕非易事，他只有耐心等待，尋求機會。但是他已毫不隱諱地公開表示對相臣的不滿，常常敕責他們，為廢除這一制度開始創造條件。恰好從他征戰多年的大臣劉基（伯溫）突然暴卒，一時有很多不利於胡惟庸的傳說，朱元璋覺得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他想由此根究，也許便能打開局面。他認為劉伯溫被胡惟庸命人用毒藥加以謀害一事，汪廣洋一定會很清楚，因此便把汪廣洋召入宮中密加詢問，想從他那裏得到證實，並聽到更多的細情。劉伯溫與胡惟庸一向不和，劉的死有很多曖昧可疑之處，汪廣洋原也是都知道的，但傳說紛紜、事例不一，又都沒個確據。他是個持身以正、小心謹慎的人，既不願捏造事實，入人以罪，也不想傳佈謠言，行涉輕薄。他採用的是息事寧人、一了百了的辦法，對於劉伯溫被害一事，竟說一無所知，外間傳言，純屬子虛。他還藉機向明太祖進言，以為如此輕疑相臣，似非聖君所宜有。他這些話，大有站在胡惟庸一邊，為他辯護的意味，使得朱元璋不由分外惱怒：調他回來，原是讓他做個耳目，看住胡惟庸，隨時作些密報；如今竟然成了